

〔徐悲鸿〕

〔梁漱溟〕

〔郭沫若〕

〔冯友兰〕

〔梁实秋〕

〔沈从文〕

〔吴祖光〕

〔林徽因〕

〔丰子恺〕

〔曹禺〕

〔冰心〕

〔老舍〕

〔李苦禅〕

倾听名人之后

〔范长江〕

的讲述

- 蜡炬成灰泪始干√宗璞
- 三松堂断忆√宗璞
- 对父亲徐悲鸿的点滴回忆√徐庆平
- 我和父亲吴祖光√吴霜
- 我的妈妈冰心√吴青
- 灵魂的石头√万方
- 父亲最后的两夭√舒乙
- 团聚√沈虎雏
- 等待√梁文茜
- 架桥√梁培恕
- 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梁从诫
- 忆先父苦禅老人几桩事√李燕
- 一个共产党员的泰然√郭平英
- 丰子恺辛勤的一生√丰一吟
- 永远的怀念√范苏苏

岩岩 编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名人后

1000

〔徐悲鸿〕

〔梁漱溟〕

〔郭沫若〕

〔冯友兰〕

〔梁实秋〕

〔沈从文〕

〔吴祖光〕

〔林徽因〕

〔丰子恺〕

〔曹禺〕

〔冰心〕

〔老舍〕

〔李苦禅〕

〔范长江〕

倾听

名人之后

的讲述

岩岩 编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听名人之后的讲述 / 岩岩编选.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2

ISBN 7-5059-4918-7

I. 倾… II. 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067 号

书 名	倾听名人之后的讲述
编 选	岩 岩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赵永颜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640×965 1/16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12.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918-7
定 价	2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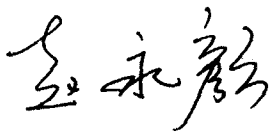
编辑这本书的初衷，不过是想通过名人之后的讲述提供一个回顾名人以及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和视角。也因为，我最初的感动——因为本书中所叙写到的父辈，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早已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可以说，这些名人伴随着诸多个人的成长，可是，这些名人似乎又是与大众十分隔离的，关于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我们又了解多少？也许，在子女的眼中，他们只是自己最真实、最本质的父亲和母亲。

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时间的冲刷只会让它在记忆中越来越明显。梁漱溟、冯友兰、沈从文等大家，他们一生的成就和思索，我们普通人很难望其项背，甚至于他们的子女也在懊悔为什么不更早一点理解父亲？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说：“先父真的不易为人所理解，而我，也是在去掉思想上的偏执之后，才有今天这水平的认识。”沈从文之子沈虎维先生也在文章中说：“最后几年团聚，中国人在重新发现沈从文，我也才开始观察他生命的燃烧方式。有过许多长谈短谈机会，倾听他用简略语句吃力地表达复杂跳动思绪，痛感认识爸爸太晚了。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

在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和他们的生命故事。多年以来，我们骨子里沉痛的东西太多，而人们也已经习惯于这些沉痛的东西，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沉痛？人和历史是不可隔离的，名人就更是如此。暂不论那些大历史的背景，我们看到的将是每个人各个不同的个人史，其中的深刻、痛苦抑或甜蜜、美好又是那么地真切。

有时候,有些人我们始终无法理解,我们也只能在这些名人之后的讲述中,更进一步地走近这些名人。也许,那些后人的讲述,那些刻骨之思、浓郁亲情,隔着许多年的路回望过去,余下的只是生命本质的纯粹和干净。在这些地方,名人也只是普通人吧?在编书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被这些普通人的普通的情感所感动,我总是会想起我不在身边的父母。又想起这一次,听到父亲的突然生病,我的泪水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连夜返家的火车上是怎样地肆意长流。

在本书里,名人之后只是一个讲述者,以一种沉静的方式讲述父辈,讲述父辈的思考、努力、挣扎和痛苦,以及自己与父辈的亲情记忆,我们在他们的讲述中感悟历史,也更感悟人生。斯人已逝,谁人憔悴?



2004年10月8日

目 录

序 > 赵永颜 / 1

永远的怀念 > 范苏苏 / 1

——回忆和父亲范长江在一起的日子

丰子恺辛勤的一生 > 丰一吟 / 13

一个共产党员的泰然 > 郭平英 / 20

忆先父苦禅老人几桩事 > 李 燕 / 28

倏忽人间四月天 > 梁从诫 / 39

——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架桥 > 梁培恕 / 69

等待 > 梁文茜 / 85

团聚 > 沈虎雏 / 89

父亲最后两天 > 舒 乙 / 122

灵魂的石头 > 万 方 / 138

我的妈妈冰心 > 吴 青 / 160

我和父亲吴祖光 > 吴 霜 / 169

对父亲徐悲鸿的点滴回忆 > 徐庆平 / 180

三松堂断忆 > 宗 璞 / 187

蜡炬成灰泪始干 > 宗 璞 / 193

永远的怀念

——回忆和父亲范长江在一起的日子

——范苏苏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今年是他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回忆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回想父亲对我们多年的培养、教育，令我终生难忘。他那爽朗的笑声，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

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三岁的时候。1946年6月5日我出生在苏北解放区淮安县，当时环境很恶劣，全面内战即将爆发，5月份父亲就调到南京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工作去了，没有见到即将出生的孩子。我出生后妈妈为我起了名字：“苏苏”（因为我是在苏北解放区生的），她独自带着我，随部队向北方撤退。后又根据上级指示，历尽千难万险，坐独轮小车，搭乘走私货轮，转往上海。到上海后又得知父亲已经从南京调回延安工作了。因为革命工作需要，1947年3月，妈妈把我留在上海的大舅家，只身去了香港。

最近，妈妈找到了一张五十多年前的老照片，是1949年6月3日

父亲、大舅沈谦和我三人的合影，当时我三岁。那时父亲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他在百忙中到上海愚园路我大舅家来看我。据我表姐沈瑜回忆，父亲看到我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又没有带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儿子，父亲就把他带在身上的手枪卸了子弹给我玩。我当时高兴极了，拿着手枪玩了半天。

现在我知道，没有看见自己的孩子的三年，正是父亲一生中难忘最重要的三年，正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三年。从南京到延安，到西柏坡，到北平，到上海，父亲始终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其中他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经历更是令父亲终生难忘。

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当时毛主席决定放弃延安打游击，父亲跟着主席转战陕北。

父亲当时领导的五十多个人被编为四大队，主要任务是收集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翻译和编辑成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参考。另外一个任务则是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社论和评论转发给涉县的新华总社，然后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发。

1947年9月11日，父亲曾经给廖承志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在最近几年才被发现。父亲在信中说了自己的几点感受。父亲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中央在文章处理上的认真精神。“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个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要重写几遍，其中重要的文章绝大部分都要在任（弼时）、周（恩来）、陆（定一）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一字不苟的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

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1947年6月8日晚上，下着瓢泼大雨，中央纵队几百个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赶冒雨行军。在天快亮的时候，周恩来对父亲说：长江啊，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父亲痛快地答应道：要写，要写。解放以后，父亲一直记着总理的话，在工作之余就写了一个转战陕北的剧本提纲。但是当时工作繁忙，随之而

来的“文革”使父亲这个愿望更加没可能实现。“文革”之前，父亲把他搜集的转战陕北的材料都交给了他曾经的同事、老战友东生同志。1989年，东生执笔完成了剧本《巍巍昆仑》，并拍成电影上映。这时，距离总理跟父亲说那番话已经过去四十二年了。

克服干部子弟的优越感

1949年11月份，父亲调回北京工作，后来我也跟着舅舅回了北京。当时我每天都磨着父亲给我讲故事，他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对于我的要求却都尽量满足。父亲的故事大都是他自己编的，赋予动物种种人的特性。在我的童年里，每天最盼望的就是父亲晚上给我讲故事的时光。他讲的故事生动极了，经常让我听得入迷。他用故事把我哄睡着了，自己却又去上夜班了。

父亲虽然很疼爱我，但是对我的要求却很严格，不允许我以高干子弟自居，不允许我搞特殊化，不助长我的优越感。

我是从“六一”幼儿园升入北京育才学校的，那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实行的是住校制度，一到周六的时候，很多干部都让自己的司机开着车到学校门口等着接孩子回家，我自然也是希望能有汽车来接我。但是我到了学校门口的时候，看到父亲的警卫员祝铁光叔叔骑着自行车在等我，我当时觉得很没面子，问铁光叔叔：“怎么您来了？”铁光叔叔说：“你爸爸不许用他的车来接。”我只好坐在铁光叔叔自行车的大梁上回家了。

由于学校的那种环境，同学们经常互相攀比，看谁的家长官大、车好。有一次和同学们“神吹”时，我突然冒出了一句：“我姥爷入党七十年了。”同学们都知道我姥爷沈钧儒年龄比较大，都以为我说的是真的，惊讶极了，把同学们都唬住了。前几年我们育才小学同学聚会，有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禁不住捧腹大笑。现在想起来的确非常可笑，因为在那时的七十年前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我的姥爷也刚刚十岁，而且他是民主人士，不是中共党员。这种笑话只有在当时的特殊的环

境中才可能发生。父亲敏锐地发现了这种苗头。到小学三年级时,特地把我从育才小学转入到一所普通小学(鲍家街小学)上学。他常说:“干部子弟学校生活太优越了。”

小时候,我很佩服“海娃”,听大人讲过他的故事,看过电影《鸡毛信》。有一次(那时我大约五六岁,还没有上学),父亲问我:“海娃好不好?”我说:“好。”父亲又问:“你喜欢海娃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喜欢。”父亲说:“那你愿意当海娃吗?”我说:“不。”“为什么?”“海娃太苦了。”父亲听了我的回答大为震惊,发现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思想里竟埋着“怕苦”的意识,以至于不敢向自己喜欢的英雄学习。我长大一点儿以后,父亲经常向我提起这件事,并要求我克服怕苦怕累的思想,树立艰苦朴素、勇于吃苦的好习惯。

在学校的时候,我经常带一些同学到家里玩,父亲有时也关心地问我同学的情况,当他听说有的同学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就鼓励我多和他们接触,不要只局限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的想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就讲过《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以说明什么样的态度才是爱护自己的子女。他说:“党的干部一定要防止自己的孩子产生特殊化的思想,从小要培养他们有劳动观点和劳动人民的感情。”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四中读初中。开始是走读,上初二的时候,父亲要求我改为住校。我当时一想,住校的伙食太差了,就不想去。父亲跟我说:“全国人民都挺苦的,咱们也不能搞特殊。”最后我还是满腹委屈地去住校了。由于经常感觉吃不饱,我多次要求回家住,父亲最终也没同意。

1962年,我因连续三年获优良奖章,初中毕业获得银制奖章而被保送本校(北京四中),所以不用参加考试,很早就放假了。我当时很高兴,对父亲说:“我被保送了,这个暑假特别长,我可以好好玩玩了!”没过几天,父亲找到我说:“你这个暑假别玩了,我给你一个任务。”我一听就知道没“好事”,果然,父亲准备让我暑假去北京郊区的全国科

协农场劳动锻炼。我实在想不通,很不愿意去。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你想不通,以后就会想通的。”我听了父亲的话,带上行李去了农场。

到了那里一看,什么活都有,自己从来没干过。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都累得腰酸腿疼。刚去头几天,全身的骨头都像要散架似的,一躺到床上立刻呼呼大睡。但一个多月后,我觉得自己的胳膊粗壮了,皮肤晒得黑极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当我离开的时候,农场的叔叔阿姨给了我两个筐,一个扁担,筐里装满了西红柿、黄瓜、茄子等。我就挑着这些蔬菜,费了好大劲坐着公共汽车回家了。一进家门,父亲就问我:“想通了吗?”“怎么样?那里不错吧?”我说:“想通了。”说实在话,当时我并未真的想通。不过后来下乡插队的时候,再苦再累,再艰苦的生活条件,别人受不了的,我都能够忍受。

身教重于言教

我家住在罗圈胡同十二号的时候,家里有两排房子,非常宽敞。后来父亲说咱们住这么多房子是不是太多了,就自动提出退了一排。房子退掉之后,我和几个弟弟就给安排到一个屋子里睡。父亲给我们找了两个上下铺的双人床。当时好多同学都知道我们家有双人床。

父亲爱睡木板床,可公家发了他一个软床,他不睡,把床立在走廊上。司机小卜叔叔对他说:“你是有这个待遇的,你不睡这床放在外边多浪费。”父亲回答说:“如果说等全国人民都睡上了这种床我再睡,不现实,有点绝对了。起码等你睡上这种床我再睡也不迟,如果睡惯了这种床再到农村搞工作时去睡炕我还能睡吗?”最后他还是通知机关把软床拉走了。

后来走廊太旧了,国管局主动提出给我们家进行修缮,当时父亲正在外地参加“四清”运动。等他回家以后,发现院子修整一新。一问,说是国管局修的。父亲说:“不行,修自己的院子怎么能让公家出钱呢?”后来他问清了修房子花了多少钱,自己交上了。

“文革”以前，首长用车是有规定的。首长私人用车要登记上报，费用从工资中扣除。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不按规定做，用了也就用了。给父亲开车的司机小卜叔叔想：别人不报我也不报。但是父亲一再坚持他私人用车一定要上报。说了几次司机还是没有上报，父亲就火了，司机一看父亲真生气了，才把父亲办私事用的车上报了。

据我妈妈回忆，“文革”前，父亲生过一次病，在养病期间，父亲对妈妈说：“我现在病了，不能为党工作，工资应该扣除。”当时并没有人要求扣他的工资，但是父亲还是要求妈妈主动上交了两千块钱，作为自己不能工作扣除的工资。

据父亲的秘书何志平阿姨回忆，在全国科协工作期间，父亲经常用自己的工资请科学家吃饭谈工作。父亲一贯公私分明，从不沾公家便宜，这种作风对我们起到了最好的榜样的作用，也在我们的思想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坦荡胸怀

在“大跃进”期间，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作报告，谈到了浮夸风的问题，他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能，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都没有，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产量。”

散会之后，司机小卜叔叔对他说：“这么大一个会你这样说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但是父亲很坦然，他说：“我只能实事求是。”

“文革”开始，父亲也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并被宣布停止职务。父亲当时在思想上是很困惑的，也十分相信自己完全是可以说清楚的。为了帮助当时的组织了解情况，他把自己从30年代保留下来的宝贵的几十本日记、笔记、信件等都交了上去，希望能够用自己坦白的胸怀换来组织的信任。

1941年，父亲在香港《华商报》写过一篇回顾抗战历史的长文《祖国十年》，因当时日军侵占香港没有全文发表，解放后一位朋友将这篇旧稿交还给父亲。“文革”开始后父亲看到了这篇旧文，发现其中有

“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之类的行文,心里也担心引起他人误会,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襟怀坦白,于是他将这篇旧稿原封不动一字不改地交了出去。但是在那个年代,他这些做法并没有换来他处境的好转,反而给了造反派批斗他的材料。

“文革”中,造反派要他写交代材料,他写了好几篇。1968年12月14日,他写了两篇,题目是《关于国际新闻社的情况》、《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1969年1月19日,他又写了《我的自述》。以上三篇文章造反派极不满意,认为他“不老实”,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当时在高压下写的交代材料证明全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没有编造任何一个历史细节,更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同志。这次再版的《范长江纪念文集》和2001年再版的《范长江新闻文集》,分别把父亲这几篇文章收了进去,这特别能反映父亲高尚的品格。

永远不忘引路人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父亲听说消息后想尽一切办法直扑事变中心。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从宁夏乘飞机飞往兰州,又由兰州想尽各种办法到达西安城下。1937年2月3日父亲进入西安,并于第二天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对他讲了事变真相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当父亲表示想去延安采访时,周恩来同志积极与延安联系,党中央派博古、罗瑞卿两位同志陪同父亲于2月6日乘车赴延安。父亲到延安后,受到了热烈欢迎,见到了中共许多高级领导人,并于2月9日晚与毛主席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长谈。这次谈话使他更加了解了共产党,父亲“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说:“我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的,对于毛主席的敬爱心情,由此树立了牢固的根基。”在毛主席的劝说下,父亲放弃了留在延安的想法,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延安,经西安赶回上海。

回上海后,父亲立即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

局》，并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陕北之行”的长篇连载。父亲不仅在文章中披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向国统区群众介绍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的文章与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编造的一套说法截然相反，使蒋介石狼狈不堪，大发雷霆。毛主席见到了父亲在国统区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还专门写了一封信鼓励他。

1939年5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几十年来，父亲对于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毛主席、周总理一直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每当提到他们，他都肃然起敬，并力争在各个方面以他们为楷模，努力向他们学习。1959年，他听说周总理戒了烟，也下决心把自己因多年做新闻工作养成的吸烟习惯改掉了。

“文革”中，江青派人把毛主席、周总理给父亲的几封亲笔信都抄走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才重新找到了这些信。

1970年10月23日，父亲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父亲含冤去世之后，我和大弟范东生到河南给父亲料理后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父亲的遗体之后在许昌火化，然后把骨灰带回了北京。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死因很难查清楚，连骨灰都不让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只能寄存在老山人民公墓。

父亲去世两年之后，他的问题如石沉大海，始终没人过问。1972年，妈妈和我们兄弟几人觉得我们应该为父亲的问题据理力争，一定要给父亲讨个公道。10月12日那天，妈妈、我、还有老三范小军在家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不是很长，我们希望主席能够过问父亲的问题。信写完之后，我和小军骑着自行车到了中南海西门，把信交给了传达室。

后来我们得知，在这之后的第四天，正好是父亲的生日，主席看到了我们的信，并在信上批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但这个消息被造反派封锁了好几个月，我们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的。

问题解决之后,我调回北京、三弟小军参军和四弟小建上大学才成为可能。之前这些事都是没有希望的。即使有了最高领袖的批示,父亲的问题仍然没能彻底解决,造反派又设置了许多障碍,我们又经历了许多曲折。

1978年12月27日,父亲的问题终于被正式平反昭雪,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从1991年开始,中国记协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每三年评选一次,这是全国中青年记者的最高荣誉奖;2000年,国务院又批准把每年的11月8日定为“记者节”,父亲当年亲手创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的日子成了全国记者盛大的节日,父亲的名字又一次被新闻界广泛提起,被全国人民所怀念。我为父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历史是最公正的

1963年我因患肾炎住进了北大医院,住在同一病房的一位病友听说我是范长江的儿子后主动向我谈起父亲,说他年轻时就看过父亲在《大公报》上写的文章,说:“当时的年轻人都很爱看。”

1999年我在中国文联工作时,因为要筹备中国文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走访了二十多位参加过第一次文代会的老同志,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些老同志都看过和熟悉30年代父亲在大西北采访时写的文章。我去李德伦同志家拜访时,曾送他一套1989年出版的我父亲的《新闻文集》,李德伦同志对我说:“我很熟悉你父亲写的文章。”说着他就从书架上取出一本30年代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对我说:“你父亲写的书,都六十多年了,我至今保存着。”我一看封面,纸都已经发黄了,李德伦同志却一直放在他的书架上。

现在我才逐步认识到,一个人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出来。父亲在30年代的西北之行,现在证明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以非凡的勇气,独特的眼光,敏锐的政治嗅觉,摸到了当时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他的文章由于介绍了红军,报道了红军长

征,对国统区的社会各界,特别是对知识界、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书在当时七次再版,销售一空绝不是偶然的。而对自己这段“过五关、斩六将”式的最辉煌、最有意义、最难忘的经历,父亲却十分低调,从未向我们讲起过。他倒反而经常给我们讲他的“走麦城”:在追求真理摸索阶段时的经历以及在北大读书时卖豆浆、面包为生的经历等等。全国解放后,曾有同志建议父亲把自己过去的作品修改之后重新出版,却被他拒绝了。他说:“修改之后就不是原来的面貌,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错了就错了,不必乔装打扮,借以骗人。”“文革”前他的作品从未再版过。1989年和2001年两次再版,也都保持了30年代他文章的原貌。现在证明他的文章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再翻开新的一页

2002年12月,我退休了,当时还未满五十八岁。回想自己退休前的几十年,确实也没做出什么突出业绩,日子过得很平常,既不是大官,也不是大款,但细一想,我的心里却又很充实,很自豪,我可以无愧地说:我没有给父亲脸上抹黑。

我从1963年起患了慢性肾炎,并因此而休学两年。这个病反反复复已经折磨了我四十多年,我也和疾病斗争了四十多年。在“文革”中我下乡插过队,回城后当过小学教员,恢复高考后考入师院历史系。毕业后先搞过一年职工教育,后调入中国文联工作了将近二十年。

在文联工作的二十年中,最值得回忆的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我在文联工作六年后,文联首次成立工会,由全机关群众无记名投票选举工会委员,再由工会委员选举工会主席、副主席。我被群众选为工会委员,并在十一名工会委员无记名投票中以九票当选工会主席。公布选举结果时,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至今我想起那场面心里都很激动,这表明了群众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工作的肯定。

第二件事,是1999年筹备中国文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当